



#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三大体系”：路径探索(下)

哲学社会科学是理论创新的先导，是文化创新的引擎，是文明积累的重要载体。对于当今中国的学术界而言，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乃时代托付的一项重大任务。然而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统筹各方面力量协同推进。受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委托，《探索与争鸣》编辑部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围绕“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专题研讨。2023年第9期刊发了“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理论阐释（上）”笔谈。本期将聚焦“三大体系”构建中的方向与路径问题进一步探索，力图在实践经验中汲取智慧，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智慧和力量。

欧阳康教授指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带有转型期的特点，存在着中外共存、新老交织、多样并存的复杂局面，需要我们对其有更加清晰的认识和应对。应当总结已经取得的成就和经验，直面尚存的问题，坚持正确的思想引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价值，坚持问题导向，努力建设高水平的学科体系，努力激发主体性和原创性的学术研究，构建新时代中国自主话语体系。张艳国教授认为，在世界文化发展格局中赢得竞争先机，建强建好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关键是科学把握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入口、自信自主的出口问题，以及由此形成的内在逻辑链及其相互关系。为此，要把握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自有规律，夯实自信自主的文化基础，立足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陈文江教授指出，努力解决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过程中实际存在的三种“话语割裂”问题，实现“政治话语”向“学术话语”的转换、“西方话语”与“中国经验”的转换、“中心话语”与“地方经验”的转换，是“三大体系”建设健康顺利推进的关键所在。王公龙教授以“全人类共同价值”研究为例指出，当前迫切需要立足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视阈，重新建构阐释“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新型话语体系，只有将这一价值体系的“全人类”属性和本质从理论上讲清楚、讲透彻，才能在世界大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更好地发挥价值引领功能，拓展新的领域、探寻新的思路，才能更好地使新型话语体系实现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冯建华副研究员指出，新技术革命打破了学科分界，传播学走到了一个新的更大的“十字路口”。他从宏观层面提出三个路向选择：聚焦“元问题”是构建学科体系的关键前提；强化实证研究是构建学术体系的基础动力；面向中国式现代化是构建话语体系的重要路标。

——主持人 叶祝弟 张蕾

## “三大体系”构建： 逻辑、现状与未来走向

欧阳康，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哲学研究所所长，  
教育部“长江特聘学者”

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简称“三大体系”）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同时也面临一系列新问题，因此需要继续努力。本文尝试探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演进逻辑，梳理已经取得的成就，探析尚存在的问题，并就进一步加快构建“三大体系”提出若干建议。

###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演进逻辑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当代建构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依托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进程而相应展开并大体同步推进的。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体系化发展也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得以全面展开的，此前主要是向苏联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有关学科知识，受到苏联模式的深刻影响。

1978年以来，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为发端，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为思想引领，以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为价值导向，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中心任务，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依托于社会现实，引发自社会问题，展示于学科，推进于学术，不断获得快速发展。

从宏观上看，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建设依托于三种主要资源、沿着三种路向一路走来，通过多方面的协同努力构建起了转型期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

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资源，以及推进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努力。我国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学习最初是经过苏联而展开的，当时我们学习的重要思想资源主要来自苏联，有着苏联模式的深刻痕迹。改

革开放以后，我国学者一方面努力“回到马克思”，回到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寻求对于马克思主义本真精神的正确理解和全面把握，以便超越苏联模式给我们带来的思想迷雾，在全面、系统、准确阐发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和丰



硕成果；另一方面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运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继续解决当代中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改革开放和新时代发展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发挥其指导作用，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

二是西方现代化理论、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管理等思想资源，以及借鉴推进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全球化。近代以来，西方社会开启了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西方现代化理论是我国走进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必要思想和理论引领，也是中国学术研究现代化的重要依托。改革开放以后，一方面我们全方位、全领域地引介西方现代化思想理论和学术成果，建立现代化科学技术和学科体系，构建中国学科和教育体系；另一方面我们努力促使其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对其加以学习、移植、借鉴、改进和创新。在此背景下，使其成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以及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历史文化根基。对于传统文化，我们曾经在全盘西化的背景下对其加以否定以致抛弃。改革开放后，我们再次重视当代中华文化的重建，一些学者努力促使其向现代文化的回归，探讨“儒学第三期复兴”“文化中国”“复兴国学”等多种可能性，培育“现代新儒学”等，探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点，在阐释、发掘、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促进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应该说，以上三种主要思想文化资源对于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构是不可或缺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三种路向都对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构建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然而，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三种资源中的任何单一资源都不能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提供充足支持。三种研究中的任何单一路向也难以通往全面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只有通过三种研究路向以致更多路向的内在融通，并由此而将三种资源以致更多资源内在整合起来，才能真正造就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这种整合的基础和机制则有赖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

正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创造性实践中，这三种路向的研究相互作用，三种资源共同融入，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内容上得到极大丰富，在体系结构上得到系统建构，在形态上得到全面提升。从思想理论方面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构成了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核心内容；从实践运行方面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通过一系列变革与创

新，取得巨大成就，形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军队、国防、外交等得到全面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体系得以全面建设和发展；从文化基础方面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获得新的思想内容和新的形态，发挥出新的文化功能；从学科体系方面看，科学研究、教育教学和人才体系得到全面建构，学科体系更加全面，学术研究全面繁荣，话语体系更加成熟，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得以全面建构。

### “三大体系”建设的主要成就

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已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更加清晰和坚定。我们已经从学习、借鉴和移植西方经验，转向了根据中国国情进行具有创新性和创造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构建，这一过程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面，我们也由跟跑到伴跑与同行，在某些方面甚至走到了领跑的位置，然而，我们仍然需要思想理论的自主引领，需要开拓自主前行的道路。这些都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建构提供了重要的现实基础和实践对象，也对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话语体系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我国明确提出建设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三大体系”的任务，极大地推进了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发展和创造性构建，取得了更加丰硕的成果。

一是确立了“三大体系”建设的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三大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这实际上是把“三大体系”建设作为建立和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必要前提条件之一，置放到了前提性和战略性的地位，引起了全社会高度关注和重视，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赋予共同使命。

二是强化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三大体系”建设中的指导地位。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必须具有科学合理的指导思想，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我们党始终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的实际相结合，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关系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深邃思考和科学判断，就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原创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促成了马克思主义与新时代的中国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为具有原创性的“三大体系”建设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三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更加健全。从学科覆盖面看，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已形成哲学、文学、历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管理学、艺术学等8个学科门类，还通过新设立的“交叉学科”门类与工学、理学、医学、农学、军事学等5个学科门类相交叉，以14个学科门类的总体格局覆盖了人类知识体系的各个方面。从学科纵深度来看，这些文科科学门类还具体分为哲学、马克思主义、党史党建、理论经济、应用经济、统计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人口学、民族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国历史、世界历史、考古学、宗教学、中国文学、外国文学、语言学、新闻学与传播学、图书情报学、体育学、管理学、教育学、艺术学、军事学等20多个一级学科，下辖400多个二级学科，还有若干的三级学科和研究方向，形成了纵横交错系统完整的学科体系，它们深入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提供学术支撑，充分体现了当代科学体系既深度分化又高度综合的发展态势。

四是学术研究体系更加全面完整和丰富多彩。我们强调以问题为中心的学术研究，全时间、全空间、全领域开展学术研究。从时间向度来看，向历史回溯、现实追踪与未来前瞻同步展开；从空间视域看，立足中国，放眼区域，面向世界；从学术视域看，立足实践，关照理论，重视决策；从推进机制看，我们构建学术平台，设置学术课题，做大学术期刊，加强学术出版，加大学术投入，重视学术交流，强化学术规范，促进学术创新，等等，为学术研究创造了更好的条件。例如，仅就中华文明研究，我们既有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为中华民族寻根究底、追踪溯源，又有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研究厘清当下中华文明形态走向，还积极探索人类文明新形态，展示出全方位的学术视野和研究视域。

五是自主话语体系构建有了很大进展，取得丰硕成果。总体来看，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需要与之相适应的话语体系。但相对于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建设的发展程度和水平，话语体系建设既可能超前，也可能滞后，既可能比较统一，也可能更加分化，存在着更加复杂的情况。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的发展相适应，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演进，与我们所学习借鉴的思想资源密切相关，经历了由学习、借鉴和移植到创建相对独立的自主话语体系的过程。这里伴随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三大体系”的整体性构建，伴随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而融入“三大体系”，伴随着西方科技人文话语体系经过改造而融入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等等，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更加具有独立性、自主性和创造性，成为新时代“三大体系”的内在组成部分。

六是“三大体系”更加深入地镶嵌到



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课程体系、教材体系、教育体系和方法体系等，融入高校教师的知识体系、教学体系和能力体系中，转化为科学研究、教育教学、人才培养、文化传承创新和社会服务的丰厚资源，成为当代中国科技创新体系、教育创新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 当前我国“三大体系”建设尚存的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处于快速发展时期，我国社会也处于深度转型期，当前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和“三大体系”同样具有转型时期的特点，呈现出中外共存、新老交织、多样并存的复杂局面，需要我们对其进行更加清晰地认识和应对。

第一，当前我国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之间尚存在着相互协同和内在契合的问题。当前中国的学科体系作为一种与科研教育和人才培养直接关联的重要体系，由有关主管部门组织学术机构和专家学者经过反复研究和多次修改完善，已经形成科学规范的体系，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有的学术研究跟不上学科发展的需求，尚难以对学科发展提供必要的和充分的学术支持，也有的话语体系复杂多样，跟不上学科发展和学术研究的要求，需要引起高度关注和重视。

第二，当前中国的学术话语体系仍然存在一种主导话语和多种话语并存的复杂格局。首先是一些在思想资源和价值体系方面存在差异的话语体系并存。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占据意识形态和学术话语体系的主导地位，形成主流话语，发挥着主导功能；另一方面，中国传统话语体系在新的学术语境中也存在，但有的缺少必要转化，与主流话语体系之间存在着差异与隔离，有时还显

得“格格不入”。此外，国外各种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话语等以各种方式通过各种途径传入，与主流话语体系存在着差异、背反、对立甚至冲突，不排除外来话语中甚或夹杂着各种形式和程度的“话语误导”甚至“话语陷阱”等。

第三，就当前中国学术和话语体系的具体实践而言，还存在着更加复杂的社会分化情况。一是存在着这三种甚至多种学术话语体系以不同成分、不同比例和不同方式所形成的新的组合；二是存在着社会变迁中生成的新话语新表达方式的复杂交织；三是存在着不同学科之间学术话语体系的无序交织及相互渗透，不同的个体自觉或者不自觉地生活于不同的话语体系之中，彼此之间存在着话语的障碍，造成话语混用、话语冲突，进而带来舆情混乱、思想困惑，妨碍学术研究和思想共识。

### 有针对性地加强我国“三大体系”建设

当代中华民族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新征程，这对我国建设具有自主创新特质的哲学社会科学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我们应当总结已经取得的成就和经验，直面尚存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构建具有中国特质的“三大体系”，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增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自信、学术自信、话语自信。

第一，坚持正确的思想引领，坚持和运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其世界观和方法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的当代发展。这里尤其要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自觉坚持人民至上，坚持自信自立，坚持守正创新，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胸怀天下。

第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价值。人民是

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初心使命和奋斗目标，促进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核心价值，也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最重要使命。要以“人民至上”作为核心价值加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体系的建设，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增强其对于其他话语体系的统摄力、整合力、引领力、对话力和融汇力，同时也要鼓励主导话语体系向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话语和文化体系学习，向外来先进学术话语和文化形态学习，使自己获得更加坚实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获得更加广泛的国际内涵和世界意义。

第三，要坚持问题导向。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际出发，关注其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深入回答世界之问、历史之问、时代之问、中国之问，尤其是人民之问，以问题的逻辑来建构科学合理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尤其注意关注新问题，聚焦大问题，把握真问题。在古今中外的多维视域中，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

第四，要努力建设高水平的学科体系。要瞄准学科发展的前沿趋势，尊重学科发展的客观规律，整合学科资源、凝练学科方向、谋划学科布局、汇聚学科队伍、筑牢学科高地、优化学科结构。要统筹发展基础学科、应用学科、新兴学科和冷门学科，重点建设一批探索客观规律、推动理论繁荣、增强原始创新的基础学科，发展一批能有效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应用学科，开创一批具有前瞻性和引领力的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扶持一批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历史价值和传承意义的“绝学”、冷门学科。要通过科学定位、夯实基础、拓展领域、突出优势、创新培植、补齐短板的思路，使基础学科扎实稳固、应用学科更具活力、重点学科优势突出、新兴学科

蓬勃发展、冷门学科后继有人。

第五，要努力激发主体性和原创性的学术研究。要强化学术研究中的创新意识，创新是学术研究的灵魂，学术体系是学科体系的核心，是话语体系的根本。学术研究包含着哲理、学理和道理研究等多方面、多层次，展示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思想理念、精神境界和价值追求等。学术创新包含着视域创新、思路创新、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等，要求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思想与方法的统一，学理与价值的统一，等等。哲学社会科学的每一个具体学科都有自身的学术体系，各门学科的学术体系共同构成了科学化、层次化、条理化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体系。要通过提高学术研究的创新性水平提升当代中华民族的哲理水平和自我意识水平，要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创新性发展中促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创新。

第六，要努力构建新时代中国自主话语体系。要强化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优势，话语体系承载着学科体系，表征着学术体系，传播着思想内涵。要努力提炼出具有中国特色、世界影响的标识性学术概念，坚持研究与普及并重，努力将政治话语学理化，学术话语大众化，中国话语国际化，坚持破立并举、以我为主、融通中外，将中国发展优势转化为理论和话语优势，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说清中国理论，阐释好中国思想，让学术更好走进大众，让中国更好走向世界，让世界更好读懂中国。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大数据驱动地方治理现代化综合研究”(19ZDA113) 阶段性成果。 ]

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既取决于自然科学发展水平，也取决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水平。在当代世界，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建构是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基础和重点，是掌握社会意识形态的要

## 以中国问题为中心推进“三大体系”构建

张艳国，江西师范大学中国社会转型研究省级协同创新中心

首席专家、教授，南昌师范学院院长

### 把握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自有规律

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总括起来，就是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sup>①</sup>它是人们在改造自然、改造社会、改造自己主观世界的长期实践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科学文化知识和文明成果，它与科学知识体系一样，是人类文化十分重要的内容，也是衡量人类文明的尺度。作为全人类共有的知识体系和文明成果，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是由全世界各民族、各国家自主知识体系汇聚在一起的文化体系。特别是近代以来，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建构表现为一个国家、民族文化发展的软实力和巧实力，也是抢占世界科学高峰的核心竞争力。“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其发展水平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品格、文明素质，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sup>②</sup>因此，在当今世界，任何一个现代政党，特别是执政党都不能不重视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建构与创新问题，既把它作为研究社会发展、掌握社情民意、制定发展战略和政策措施的智库依据，又把它作为建设现代文明、促进文化创新、提供发展的精神动力与智力支持的战略抓手。从历史规律来看，任何国家、民族、政党，如果忽视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它就不能实现文化创新，也不能形成文明积累，甚至会丧失创新发展的主动权，在世界文化格局和文明交流互鉴中落伍掉队。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规律性现象，也是国与国实力竞争、民族与民族文明交流的一般性特征。



①《坚持党的领导 传承红色基因 扎根中国大地 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人民日报》2022年4月26日。

②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

津和抓手。新时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呈现出增量叠加、创新驱动的良好态势。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站在人类文明发展时代高度，科学分析新时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建设的形势、机遇和要求，深刻回答了建构什么样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怎样建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文化使命与时代责任是什么等重大问题，为新时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发展、加快发展、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准确判断当代世界文化发展形势，科学掌握中国当代文化发展规律，体现时代性，掌握主动性，在世界文化发展格局中赢得竞争先机，建强建好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关键是科学把握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入口、自信自主的出口问题，以及由此形成的内在逻辑链及其相互关系。只有这样，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的建设才能赶上时代、引领时代、无负时代。

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自有其规律，即以各自民族、国家为单元，以民族文化传统为依据独立向前发展，它并不是在全球范围内形成总体“一二一”式齐整地向前推进的。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文化发展总是内生的、独立的、开放的、进步的，其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也是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世界文化的发展，总是在各民族、各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碰撞中向前迈进的。没有民族特色的文化，在世界上是没有的。文化越是世界的，就越是民族的；越是民族的，就越能形成世界性文化。<sup>①</sup>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总是基于一定的历史文化遗产、经验积累和思维习惯来认识世界、社会和自己的。这样就形成各自具有地域特点和民族智慧特征的哲学社会科学。试图立足别的国家、别的民族来建立自己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总是行不通的。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必须立足于中国大地，以中国问题为中心，这既是由文化在各国发展的规律决定的，又是由哲学社会科学的社会属性决定的。一般来说，哲学社会科学既具有科学的属性和功能，又具有社会意识形态的性质和作用，被赋予鲜明的思想教育、理论指导、言行约束能力和特征。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当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这就是路径入口。以中国问题为中心，既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问题，理清中华文明的源头及其发展规律，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理论自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借助丰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推进中国当代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更要研究中国当代问题，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制高点上，立足中华民族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增强中国学术的国际影响力；还要研究中国发展走向问题，面向未来，走向世界，通过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贡献高品质思想成果，为人类文明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只有紧扣中国问题、中国实际、中国实践、中国发展这个入口，才能精准掌握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的总开关、总阀门、总枢纽，充

分彰显中国之路、中国之理、中国之治的思想追求，为研究解决事关党和国家全局性、根本性、关键性的重大问题提供思想资源和智力支持。

### 夯实自信自主的文化基础

只有紧扣中国问题这个关键、这个核心，才能通向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坦途。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国自己的问题，而不是其他国家的问题，这就是自主性；充分发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主体性，既在“为祖国、为人民立德立言中成就自我、实现价值”，又实现自己肩负的文化使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断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sup>②</sup>更为展现人类情怀、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交融贡献中国精神、中国智慧。在推进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伟大事业中，“中国问题”与“自主建构”具有紧密相连的逻辑关系。换言之，衡量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建设是否是“自主”的标准和根本标尺，并不是别的什么，只能是研究“中国问题”、形成“中国结论”、升华“中国理论”、体现“中国方法”、具有“中国影响”，其被赋予分析问题的深刻性、透彻性、科学性的优势和特征。

建构中国自主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必须坚定学术自信，提升学术自觉，增强学术主动，担负学术使命，创造更多高质量、高品质、有影响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谱写新时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新篇章。有信心才会有信念信仰，自信才能自主，自信才能自强。因此，自信是自主的决定性因素，学术自信是学术自主、充分发挥学术创新力的深厚基础。自

<sup>①</sup>《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55页。

<sup>②</sup>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



- ①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制洋器议》，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48页。
- ② 毛子水：《国故和科学的精神》，《新潮》1919年第1卷，第5号。
- ③ 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葛懋春、李兴芝编：《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第345页。
- ④ 陈序经：《全盘西化的辩护》，《独立评论》，1935年第160号。
- ⑤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0页。

信既是一种积极态度，也是一种坚定立场，还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是一种自信；“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七古·残句》）是一种自信；攀登世界哲学社会科学高峰，“藏之名山，传之其人”（《汉书·司马迁传》）更是一种豪迈的自信。当然，学术自信是一种文化自信，它也来自文化自信。没有这种奔涌向前、生生不息、坚定不移的文化自信，是不可能从事自主创新工作的，也不会有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事业。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历史悲剧。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上，也应作如是观。

坚定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之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发展之路，就是要坚信自己的道路选择，坚定文化自信，坚定学术自信，克服在“走自己的路”上犹豫、摇摆的态度和行为，坚决反对“全盘西化”、文化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文化倾向和思想错误。与学术自信相对立的是“学术不信”，或“学术他信”，其表现就是刻舟求剑、照猫画虎、生搬硬套、依样画葫芦的做法，它是用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概念术语来裁量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裁量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道路范式，简单套用于我国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不愿意、不能够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它严重偏离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着力点、着重点，如果任其蔓延泛滥，就

会在思想文化领域乃至党和国家事业中造成严重的后果。

构建中国自主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文化自信、理论自信和学术自信。在中华学术自信问题上，我们在近代中国是曾经吃过亏的。面对“西学东渐”大潮，1861年，冯桂芬提出“四不如人论”；<sup>①</sup>1915年，毛子水提出“中国学术思想不重要论”；<sup>②</sup>后来，胡适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百不如人论”；<sup>③</sup>1935年，岭南大学陈序经等提出“全盘西化论”。<sup>④</sup>这些观点虽或出发于挽救民族危亡、救亡图存，但也体现出“文化不信”“学术他信”，就拿错了药方，成为值得反省的历史资料。在新时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底气、骨气和志气既来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强劲之根，又来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丰硕成果，更来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辟未来、走向未来的磅礴伟力。不断夯实自信自主的文化基础，张扬中华学术固有的底气、骨气和志气，将有助于秉持气势如虹、定力如磐的自信自觉，从而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不断推向前进、推向世界。

### 立足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道路决定命运，思路决定出路。纵观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总结不同文化形态、文明类型在建构其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经验教训，成功者有自己建构的正确道路和科学规范，失败者有道路选择和规范遵循上的严重失误。走建构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中国之路，其前提是找准中国问题这个关键切入点，找准前进的可行路径；其基础是确立文化自信、学术自信，发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奋勇争先、时不我待的主体作用，自主创造、积极进取；其规范和出路是坚持守正创新，确保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走在康庄大道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从事的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sup>⑤</sup>要坚持守正创新，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赓续历

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新时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自主知识体系创新的道路规范是守正创新,内涵特征是自主性、主体性、创造性,目标是与时俱进的科学形态和世界范围的学术影响,它们应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守正创新,既是推进新时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自主建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正确态度、科学方法,也是实现新时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自主建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必由之路、可靠出路。

坚持守正创新,就是要守中华民族在中国历史上创造的哲学社会科学优秀传统文化之正,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哲学社会科学与时俱进、转化发展之新。守正创新,它本身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极的思想方法,蕴含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源流之中。所谓守正,就是要行正道,向光明,“循法守正”;<sup>①</sup>创新,就是要改革求变,去旧立新,实现新陈代谢,“革弊创新”,<sup>②</sup>古人说的“旧邦新命”<sup>③</sup>也是创新。中国古代哲学社会科学是我国当代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积极而重要的文化学术资源。围绕天、地、人,突出人伦,揭示人的精神;观照家(庭)、国(家)、社(会),聚焦家与国,体现家国情怀,中国人自古就建立了博大精深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在五千年文明传承发展中,先贤不但赋予中国传统哲学社会科学古典文化、传统学术形态,还规范了传统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形式、中国风格、中国气韵。特别是蕴含其中的人格力量、文化精神、学术品格、思想追求、强烈的文化使命感和学术责任感,如“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的文化复兴思想,<sup>④</sup>“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文化担当精神,<sup>⑤</sup>“学术乃天下之公器”<sup>⑥</sup>的文化追求精神等影响深远,它们具有积极的现代活力,值得发扬光大。如果丢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形式、传承、气质、学术精神,也就丧失了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的源头活水。

坚持守正创新,就是要坚持守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之正,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之新。马克思主义既是在近代西方兴起、发展、形成的全世界无产阶级追求解放的政治理论、意识形态,又是当时世界

上最先进、最具有思想光芒的哲学社会科学,至今依然是极具真理价值和文化活力的思想。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近代以来我国发展历程赋予的规定性和必然性。在我国,不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哲学社会科学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最终也不能发挥应有作用。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不断把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而且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指导地位,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两者“相互成就”,极大地发展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丰富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内涵和时代品质,推进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主体性、自主性和创造性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它本身就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发展,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获得繁荣发展活力的最大法宝,这是必须长期坚持的根本经验和有效方法。

坚持守正创新,就是坚守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推进新时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的根和魂。对于突出建构的自主意识、高扬创新的主体精神来说,也是如此。

[本文系全国红色基因传承研究中心重点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历史重要论述研究”(22ZXHYZ01)、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重大招标项目“习近平关于历史科学重要论述理论内涵和重大意义研究”(LSYZD2101)阶段性成果。]

① 司马迁:《史记·礼书》,裴骃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159页。

② 魏收撰:《魏书·李彪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396页。

③ 《诗经·大雅·文王》,王秀梅译注:《诗经》下,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577页。

④ 参见《论语·尧曰》,张艳国:《论语》智慧赏析,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368页。

⑤ 张载:《张载集》,章锡琛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376页。

⑥ 梁启超:《图书馆学季刊》发刊辞,《梁启超全集》第13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69页。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是一项艰苦、复杂、漫长的学术过程。这不仅是因为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有其内在的规律，只有完整系统地掌握这个规律，才有可能为增进学术做出贡献，而且知识生产



是一种特殊的过程，它要求知识生产者立足于社会生活，在对具体的生产生活开展实际观察的基础上，概括总结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与方法，在与以往的学术成果和同行专家对话的基础上丰富和完善相关学科理论，创造出富有新意的专业知识和文明成果。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经历了独特的发展历程，也积累了大量的学术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不仅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且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奠定了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基础。但是，面对中华文明融入世界文明体系的重要历史使命，面对中国特色“三大体系”构建的重要战略任务，面对中国学术与世界学术体系平等对话、做出贡献的重要需求，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完成。这其中，努力克服哲学社会科学过程中实际存在的三种“话语割裂”现象，实现“政治话语”向“学术话语”的转换、“西方话语”向“中国经验”的转换和“中心话语”

## 克服话语割裂：话语体系建设的“三重转换”与“四个关键”

陈文江，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

与“地方经验”的转换，是决定“三大体系”建设能否健康顺利发展的关键。

### “政治话语”向“学术话语”的转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长期存在着一种以“政治话语”替代“学术话语”的状况，这种状况是与中国革命的特殊历史背景和历程密切相关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不断与各种歪曲、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做坚决斗争，保证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同各种错误思潮作斗争，对整个社会都形成了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学术界逐渐建立起以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为标准的评价方法，广大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们也习惯于以标准化的政治术语表达自己的学术立场，出现了政治标准替代学术标准的“过度政治化”偏差现象。

学术评价中“过度政治化”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具体表现：一是以口号化的政治术语替代学科专业的知识体系建构，其表现方式是以“姓资姓社”作为衡量一个学科的标准，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替代具体学科的研究方法等；二是以“套用”的方式简单化地处理学科发展过程中复杂的专业性问题，如用英雄奴隶、儒法斗争、进步反动等二元对立的观点和方法解释历史；三是以政治影响力作为衡量标准去评价学术成果的学术价值，其中不乏以行政级别和上级领导的判断与评价作为超出学术标准的评价方式；四是“表态性”的政治化要求实际上助长了学术研究中形式主义的风气，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术研究中应有

的自由探索和独立思考的创新性思维，这对于青年学者的健康成长是不利的。

过度行政化、以政治话语完全替代学术话语在本质上是一种不健康的学术风气。其突出的表现是学者们习惯于用政治话语表达自己的“正确性”，但学术的正确性恰恰是运用学科化和学术性的话语展现自身研究的理性化、科学性和合理性。学者们不是运用研究的合理性和解释的创新性去展现自己的正确性，而是使用政治正确去展示研究的合规性，这就会导致学术研究失去它应有的价值。这样做的结果不仅无益于建立起符合科学研究规律的知识结构和话语体系，而且无法与国际学术界建立起正常沟通和健康对话的有效机制。即使是在国内的科学研究和学术交流中，如果学者难以摆脱以解读中央文件、阐述上级精神为主的“标准化”研究，那么其研究的结果必然难以立足中国的实际。

当然，我们也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在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的过程中，坚持学术研究中意识形态的政治化要求实际上是一种政治立场的底线要求，要求中国学者不能站在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对中央的大政方针的敌对势力的立场研究中国的学术问题。它要求研究者真正做到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作为学术研究的指导思想，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研究中国问题，总结中国经验，提出对中国社会发展具有解释力的理论和方法。它鲜明地反对机械地套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替代具体学科研究的核心理论和知识体系、反对割裂地用方法论原则替代具体学科的研究和分析方法的简单化做法，克服“绝对化”和“完全替代”的不良现象。

因此，充分认识将“政治话语”有效地转化为“学术话语”的重要性，在“三大体系”的建设中最大限度地按照学术界公认的标准搭建学科体系，按照国际学术界通行的方法总结中国的历史经验、开展学术研究和学术评价、创造源于本土发展和经验的知识系统，建立植根于中国大地的话语方式和话语体系，不仅能够体现中国学术界科学研究的气度与胸怀，为广泛深入地开展国际学术交流奠定坚实基础，而且能够在学术实践中真正体现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具体应用

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具体实践当中，真正体现其“价值引领”的“活的灵魂”的意义。

### “中国经验”与“西方话语”的转换

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的过程中，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认识和处理好学术研究中“西方话语”和中国特色研究经验的关系问题。

近代以来，基于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强烈诉求，历代学者都把学术研究的“本土化”作为自身努力的目标。这种努力不仅追求在学术领域摆脱西方殖民主义的束缚，更重要的还在于体现国人对于中华民族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自信，体现自身理论创新能力和文化发展的自信。这种状况本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实现自身发展目标过程中的正常状态，但在现实的学术实践中，超越学术研究领域的“中国化”诉求正在背离“本土化”的初衷，出现了一种违背理性精神和学术发展规律的“反智化”倾向。这种倾向有以下四种具体表现：一是把“中国化”作为衡量学术立场的标签，把“中国化”和“西方话语”简单对立起来，凡事必须要找到“中国化”的表达方式，拒斥西方学术理论和方法；二是罔顾事实地强调某些研究方法不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简单地排斥采用量化研究等西方学术研究中普遍运用的分析方法；三是不能主动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变化和重大发展需求开展深入的调查研究（包括对西方世界的研究），习惯用传统的治理经验代替科学研究；四是研究者往往不能潜心学习国际学术界公认的成熟理论和方法，在还没有系统完整地认识和掌握相关学科的历史源流、学科知识和方法体系的前提下就妄加评议、拒斥批判。上述种种看似“正确”



的做法是极为危险的，“标签化”的学术方式无不透射出当代学术研究中浅尝辄止、轻浮虚夸的不良学风，反映出“消费时代”和“快餐文化”的特征。在建构“三大体系”的过程中，必须坚决遏制上述学术研究中的不良现象，坚决克服学术研究中的不良作风。

不可否认的是，学术界的确曾存在着“言必称西方”的学术现象，这是与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学科体系、学术标准和话语方式大多是近代以来、有些甚至是改革开放之后才系统地由西方国家引进分不开的。对于这些来源于西方的学科、理论与研究方法，国内学术界整体上还处于学习、消化、应用研究和教学传播的过程中，国内学者独立创新的学术贡献并不多，因此在学习和应用的过程中就不可避免地、经常性地梳理西方学者的理论脉络和学术传承。但是，学习和掌握西方学术理论和话语方式，并不是不要自己的学术立场，相反，我们需要在理性精神的主导下，通过虚心学习保证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回归科学研究的本源，认真探讨哲学社会科学诸学科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认真研究每一个学科所涉及的本体论问题，全面认识和了解学科的知识论体系，系统掌握学科的方法论和具体研究路径，建立起运用相关理论范式分析和解释社会现象、科学问题的能力。这不仅需要艰苦的学习和规范化的学术训练，也需要运用相关理论和方法开展深入的调查研究与实践。

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大多数学科都发端于西方世界。这些学科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而且在自身的发展和传播过程中汲取了世界文明的精华和各国学者的研究经验，已经成为人类文明发展中的共同成果。那种简单地将这些非发端于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归

因为“西方话语”而加以排斥的做法是非常有害的，它不仅会阻碍我们更好地学习和吸收人类学术文明体系的积极成果，也会对“三大体系”建设造成负面影响。因此，必须严肃认真地处理好科学研究中“学术话语”和“中国经验”的转换问题，自觉认同已经获得学术界公认的学术规范和理论方法体系，自觉地把中国的学术研究当作人类学术文明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和对中国经验的总结，为解释人类面对的共同难题提供来自中国的话语方式和话语体系，最终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可以被广泛接受的中国方案。

当然，面对复杂的国际关系和西方文化霸权，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必须站在自身的立场有效地抗御西方价值观的侵袭，在涉及原则立场和利益关系的根本问题上宣示自己的主权、体现自己的价值追求、提出自己的理论方法、拿出自己的解决方案。在这一前提下，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就成为摆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面前最为重要、也是最为紧迫的重大任务。与此同时，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践和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方式又要求无论是管理者还是理论工作者都能够立足中国本土立场、研究中国当前社会现状，尽早总结发展出一系列能够有效解释中国现象、解决中国特殊问题、体现中国价值、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

### “中心话语”与“地方性话语”的转换

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的建设中，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也必须处理好，即“中心话语”与“地方性话语”的转换问题。

在发展社会学的知识体系中，“中心”和“边缘”始终是不可分离的两个重要概念。处于中心地位的区域和主体集中了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掌握着更多的政治和行政权力，在政治上更具优势，能够决定资源的分配和政策的制定，是文化交流和创新的中心，具有更多的文化资源和机会；而边缘地区发展相对滞后，经济差距等可能导致贫困、失业和不平等问题，

政治参与度低, 缺乏对决策过程的影响力, 文化多样性受到威胁。在全球现代化发展的整体进程中, 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长期处于被边缘化的状态, 我们正当的权利和呼声往往得不到重视。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取得的成绩, 有效地助力了边缘化状态的改变, 中国正逐渐成为世界文明体系中不可小觑的重要力量。

作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学术投射, 中国的学术体系建设中也存在着典型的“中心”与“边缘”的关系问题。以国家主流学术话语为标志的中心话语和学术资源丰厚的东部地区的学术圈, 主导了中国学术话语的主体部分, 相对应地也就出现了依附于中心话语的“边缘性话语”, 如来源于西部地区学者、反映西部地区发展需求呼声的“西部话语”, 反映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呼声的“东北话语”, 反映部分少数民族群体利益和发展需求的“民族话语”, 等等。这些话语大部分是体现了被边缘化的相对欠发达地区的“地方性知识”和特殊利益诉求的地方性话语, 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内边缘地区和边缘群体的呼声。

例如, 所谓“西部话语”原本来自部分西北地区社会学者关于现代化和东西部差距的研究。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 一是在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 实际存在一种以东部地区为中心衡量西部发展的“东部主义”思维, 在它的作用下, 西部地区被普遍地解读为边缘、落后、愚昧和需要拯救的地区; 二是站在西部人的立场上看待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没有西部的现代化是一种不完整的现代化。构建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话语体系, 必须倾听包括广大西部地区在内的“边缘”“落后”“欠发达”“后发展”地区人民大众的声音, 必须体现长期被边缘化的“落后地区”和“边缘群体”利益诉求。

“西部话语”在学术研究中具有以下独特价值。首先, 它强调对西部地区的历史、文化、社会和经济等方面的深入研究, 为全面和准确认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提供了新视角。其次, “西部话语”鼓励学者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 促进学科交叉融合和跨领域合作, 有助于学术创新和知识的整合。再次, “西部话语”强调对地方实践和案例的重视。通过深入研究西部地区的实际问题

和经验, 人们可以获得更具体和实践性的知识, 为政策制定和社会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西部地区的研究案例也可以为其他地区的学术研究提供借鉴和启示, 促进全国范围内的学术交流与合作。

实现“中心话语”和“地方性话语”的转换, 本质是从后现代主义的立场来看待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构建。这种转换既要求遵从处于中心地位的主流话语建构起来的话语体系, 又强调充分关注“边缘”“弱势”和“地方性话语”对于丰富和完善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不可或缺性。这种转换关注地方的具体情境和实践, 强调地域多元性, 反对将地方性的经验和问题简单地归纳为普遍性的规律或范式, 突出强调具体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和地方性知识、经验对于知识生产的不可分离性。这种转换也关注特殊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问题和治理实践对于丰富和完善中心话语的特殊贡献。它在始终保持对宏大叙事和总体性解释关注的同时, 更应关注微观和局部层面的研究, 倾向于深入研究各个地区的具体案例、社区或个体, 通过细致观察和描述来揭示地方社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始终倡导对权威和正统观念保持怀疑态度, 强调批判性思考和多元观点的存在, 鼓励多元的研究视角和观点的表达; 始终关注社会边缘和边界的存在与问题, 主张探索边缘群体、边界地区的生存状态。可以说, 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构建是真正能够体现全体人民共同意志和愿望的整合价值体系, 是中国式现代化对世界文明体系的特殊贡献。

### 话语方式转换中的“四个关键”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充分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发展特点和学



术需求。经历了 70 多年的现代化建设，国人已经深深地领悟到，在系统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人文社科建设规范和经验的前提下探索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是实现“三大体系”建设品质整体提升的必由之路。在这种前提下，我们还必须在“三大体系”建设过程中做好以下四个关键工作。

一是体现中华学术文化发展的共同性，充分做好中国特色的学术共同体建设。虽然我们已经有了规模庞大的高等教育体系，建立起了实力强大的国家科学研究体制，形成了包括党政部门、社科院、党校行政学院、高校、科研院所、社会智库等的哲学社会科学组织系统，但是在学术共同体的组织、机制建设方面还存在明显的不足。加强中国特色的学术共同体建设，必须充分调动、有效整合各种社会力量，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使之在组织制度、体制机制和活动方式上能够突显中国特色，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等方面能够应运而生、脱颖而出，真正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人才和队伍优势转化为学术创新优势。

二是体现中华文化的自主性和创新性。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和丰富文化资源的国家，具有独特的文化传统和发展历程。应当采取各种有效措施，积极引导各种类型的研究队伍关注中国发展，研究中国问题，在充分保证国家安全的基础上，向学术界开放学术研究领域和资源。要扩大设立国家研究资金的资助领域和资助范围，力争使有益于国家发展、民族团结、社会进步的研究项目和研究者都能得到来自国家和社会的有效支持；改变学术研究评价机制，使体制内、体制外有意愿并有能力开展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人士都有机会得到与其研究能力和研究成果相匹配的肯定性评价，真正做到“不拘一格降人才”。

三是体现中华文化的多样性和包容性。中国地域广阔、历史悠久、民族众多，每个地区都具有不同的历史、文化、社会和经济特点。立足中国立场，构建“三大体系”可以在学术上更好地关注中国各地区、各民族发展的特殊问题，充分体现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和进步的历史进程，全面总结中国式现代化的经验，为推动区域发展和社会进步建立有效的理论和方法支撑。也正是因为中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民族众多，就需要更多的学者能够走出象牙塔，直面百姓生活，深入研究中国各地区独特的发展需求和现实问题，总结不同地区的治理经验，使中国式现代化展现出更加多样的风采。中国人口众多，面临着独特的发展需求和现实问题。构建有中国特色的“三大体系”可以更好地了解 and 关切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求，深入研究发展进程中实际存在的各种问题，最终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适合中国国情和发展实际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成果。

四是体现中华文化的开放性。中华民族从来就不是封闭、保守、固步自封的民族。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敞开胸怀，拥抱整个世界，在与世界其他文明体系的交流中为世界文明的进步做出贡献，是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任务。倡导构建中国特色的“三大体系”，就是要以学术文化的方式为广泛开展国际学术对话与交流做好充足的理论准备。以国际学术界广泛接受的方式展示中国学术的风采，发出中国学术界的声音，为人类共同面对的各种困难和问题提供中国式的解决方案，就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构建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肩负的重要使命。在开放的交流中，促进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文明互鉴，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学者的力量。通过传播体现中国特色的研究问题、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充分展示中国的文明传统和价值理念，显示中国人所思、所想、所求，在国际学术交流中推进东西方之间、不同国家文明之间的了解互信，从而增强中国学术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

## 话语体系的建构需要研究视域的转换

——以“全人类共同价值”研究为例

王公龙，中共上海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执行院长、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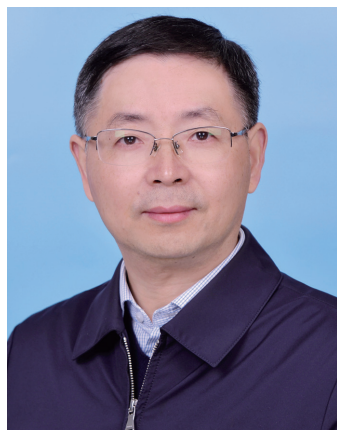
社会科学的研究总是通过某种话语体系加以推进的，话语体系的构建往往影响乃至制约着研究的思路、方法、进程和研究结果。构建具有充分解释力的话语体系不仅有助于深刻阐释理论的学理意蕴和本质特征，而且有助于阐明理论提出者的真实意图，避免官方话语与学术话语的出入，也有助于破解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难题，扩展理论的影响力和传播力，将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更有效地转化为中国的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

自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人类共同价值”理念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初步构建起三种主要研究视阈或者说话语表达形式，即国际政治、中国文化和对外传播。现有的研究对于回答“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诸多基础性理论命题有明显优势，然而一旦转入实践领域，在思考和拓展“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国际影响力、增强国际认同度方面却经常会陷入自我设定的理论语境，造成话语解释的困境。当前，迫切需要通过转换“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研究视阈，立足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视阈，重新建构阐释“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新型话语体系，只有将这一价值体系的“全人类”属性和本质从理论上讲清楚、讲透彻，才能为在世界大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更好地发挥价值引领功能拓展新的领域、探寻新的思路，才能更好地使新型话语体系实现理论和实践的统一。

### “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三大研究视阈及其困境

任何话语体系都是依赖于特定的研究视阈而发生作用并获得发展的。研究话语体系有必要首先分析理论展开的研究视阈。当前，国内学界关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研究有三种代表性的研究视阈，各有其研究的主要命题。国际政治视阈主要基于国际政治理论

和现实国际政治环境展开讨论，着力从理论上分析“全人类共同价值”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全人类共同价值”与西方“普世价值观”的区别，进而阐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国际政治意义。中国文化视阈主要探讨“全人类共同价值”与中



国文化尤其是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渊源关系，揭示其深厚的中华文化基础和中国文化底色。对外传播视阈则主要立足中国、面向世界，思考如何增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影响力和国际认同度，讲好中国故事，提升国际话语权。

总体上看，现有的三种研究视阈初步构建起认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多元视角，打开了理论分析的多个场域，有助于多维度立体阐释其生成背景、理论内涵、内在结构、理论特征等。但随着“全人类共同价值”研究的拓展和深化，现有研究视阈的各自“短板”也日益暴露，在一些方面已经形成了研究的困境。

第一，战略博弈工具论。在国际政治矛盾和斗争日益加剧的背景下，研究者要完全避开现实国际政治考量是无法做到的，往往既要遵循国家主义、权力政治的国际政治内在本质和国际环境严峻复杂的客观现实，又要顾及中国自身的外交立场和政策主张。在双重目标的交织下，研究者难



免会顾此失彼，难以把“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本意和目标真正讲清楚。

第二，价值意义虚空论。在中国文化视阈下，“全人类共同价值”体现着中国文化的特质，传承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反映了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追求。但也恰恰因为如此，“全人类共同价值”有时会遭受西方世界的各种诘难甚至诋毁，使得中国文化研究视阈不得不面对如下的连续性追问：“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现实性如何确证？普遍性如何体现？

第三，中国价值扩张论。中国提出“全人类共同价值”并不只是为了表达自身的价值主张，其更大的心愿是让“全人类共同价值”获得广泛的国际影响、国际共识和国际认同，进而使之形成国际规范并为国际社会自觉遵循，以引领人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这就必须将“全人类共同价值”纳入传播学领域，开辟对外传播的研究视阈，思考如何有效地将“全人类共同价值”传播出去，争取广泛的国际认同。但现有的对外传播研究视阈通常关注传播的主体、途径、机制、方式等传播学理论所关涉的基本问题，而较少超越专业的局限从理论本身进行深层次思考。殊不知，问题的症结往往并不在于传播本身，而在于对传播内容的精准、深刻的阐释。

不难发现，三大研究视阈面临不少现实困境，最为突出的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全人类”“共同”与“价值”日渐脱离，一些人将其误读为中国的独有价值，并将其与世界各国的价值观对立起来，从而使得“全人类共同价值”有时会偏离理论的本意。因此，要把“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理论本意讲清楚、讲深刻、传出去，必须从更深的理论层面进行思考，尝试拓展研究视阈，建构新型话语体系，从根本上探寻摆脱困境的思路。

## “全人类共同价值”的 马克思主义研究视阈的切换

马克思主义是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指明人类前进方向的理论，“全人类共同价值”本质上也是思考人类前途和命运的思想。“人类”是它们共同关注的主体，两者之间无疑是有内在贯通和契合之处的。由此切入，开拓马克思主义研究视阈，将“全人类共同价值”全面引入马克思主义理论语境，有助于逐步建构起基于马克思主义研究视阈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具体指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进行透视、解读和论证，形成对“全人类共同价值”思想理论、基本观点的学理化阐释和体系化表达，推出一系列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底蕴的新概念、新观点。建构“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新型话语体系有助于厚植“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深刻揭示其“全人类”的理论定位、理论站位和目标指向，而且有助于摆脱国际政治、中国文化以及对外传播等研究视阈的困境，更加有效地争取广泛的国际认同。

第一，立足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有力论证“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历史性和现实性，弥补对外传播研究视阈的不足。如前所述，对外传播研究视阈关注如何将“全人类共同价值”有效地传播出去，这固然是重要的，但传播出去并不等于受众真正理解和认同传播的内容。解决认同的关键是让受众真正认识到，“全人类共同价值”是现实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接受和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是维护自身利益、解决自身问题的迫切需要。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可以成为激活国际社会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内在动力的重要分析视角。首先，“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人类普遍交往实践中形成的价值追求。作为人类“类意识”的价值表达，“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实践基础上生成的社会意识，是全人类命运与共意识觉醒后的观念产物，反映了当今人类社会在互动实践基础上形成的共同价值追求，集中表达了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的价值理想。其次，“全人类共同价值”是有效维护人类共同利益的价值追求。人类

正是存在着共同的利益，才有共同的话语和规则，不同国家和群体之间才能坐下来进行交流和对话，追求合作共赢。“全人类共同价值”正是对共同利益关注的价值表达，反映了世界各国、各民族谋求实现共同生存、共谋发展、共享红利的现实需要。再次，“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应对和解决全球性问题的价值选择。一方面，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另一方面，恃强凌弱、巧取豪夺、零和博弈等霸权霸道霸凌行径危害深重，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应对和解决全球性问题，需要具有解释力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引领。

第二，聚焦马克思主义价值观，深刻阐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理论本意，有效避开大国博弈因素的干扰。首先，和平与发展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基本前提。“全人类共同价值”首先强调“和平”“发展”的重要性，把“和平”“发展”确立为价值体系的基础和前提，旨在为当下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最基本的条件。其次，公平正义是维护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根本准则。在当下的国际社会，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不仅仅取决于单个国家在国内范围对公平正义价值观的重视，还取决于国际社会能否将其确立为基本的行为准则，并形成有效的国际约束。要在当下的现实环境中促进各国人民的自由全面发展，就必须旗帜鲜明地倡导“公平”“正义”的价值准则，推进和完善全球治理。再次，民主自由是保障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权利基础。“民主”意味着“国际关系民主化”，“自由”意味着在国际体系中捍卫国家合理表达利益诉求和合理分享发展成果的自由，任何国家都不得把自己的利益和意志凌驾于他国之上。

可见，将“全人类共同价值”置于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理论语境中进行审视，不仅可以构建全新的分析视角，探寻其马克思主义价值根基，更重要的是，可以避开国际政治因素，尤其是大国博弈的纠缠和干扰，摆脱无止境的国际矛盾和冲突的纷争，将研究的切入点、聚焦点和着力点始终放在“全人类”问题上，把“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全人类”“共同”的理论意蕴和理论特质充分揭示出来，进而阐明“全人类共

同价值”的价值主体是全人类，价值客体是反映全人类共同利益、共同愿望的价值表达。只要始终沿着“全人类解放”的内在逻辑不断地追问，深入思考世界上所有人都向往和追求的理想生存条件和美好生存状态，人们就会更加深刻地认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本真面目，在更广阔的空间、更大程度上促进价值共识的凝聚。

第三，依据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有力证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普遍性意义，弥补中国文化视阈的不足。中国文化视阈对于阐释“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文化底蕴无疑具有独特的解释力，但要增强中国文化视阈的说服力，在继续重视中国文化视阈的同时，还要引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将分析视阈提升至全人类的高度，从更深的哲学层面思考“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普遍性意义，深刻阐明其普遍性和特殊性有机统一的理论特性。“全人类共同价值”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特别是中国古人的“天下观”，这是毋庸置疑的，也是中国人之为自豪的，这是其特殊性。但更应该看到，“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推进“两个结合”的理论产物，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所形成的重要理论成果。也就是说，“全人类共同价值”汇聚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是“精髓”和“精华”在贯通、融合基础上形成的新话语、新理念、新思想。

### 有涵盖力、解释力和说服力的 话语体系的可拓展空间

任何一种研究视阈和话语体系都是利弊伴生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也不例外。开拓“全人类共同价值”的



马克思主义研究视阈，建构起新型的话语体系，形成马克思主义叙事逻辑，揭示马克思主义理论意蕴，是为了更加深刻地理解这一价值体系的深厚理论基础、价值基础和哲学基础，更加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把握其“全人类”的理想追求、理论视野和理论品格，更加充分地认识其在当下的理论创新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而不是刻意在国际政治实践中突出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属性，更不是搞意识形态划线。在开辟新的研究视阈、建构新型话语体系时，如何既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论证“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全人类”价值理想，又避免落入西方霸权国家布设的“民主—威权”话语陷阱，就成为必须直面的问题。

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积极探寻解决难题的路径，尚存在不少可以拓展的空间。

首先，求大同、存大异。“全人类共同价值”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形成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它也是对不同文明背景下人类共同的价值理想的高度凝练，充分体现了其他国家、民族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追求，超越了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分野，具有鲜明的“全人类”特质。尽管它是社会主义中国提出的价值体系，但这一理论从不以意识形态划线，而是主张在不同的价值观之间求大同、存大异，寻求最大公约数。阐释“全人类共同价值”需要始终坚守求大同、存大异的基本考量，以极大的包容心态和宽广的天下胸怀，最大限度凝聚起全人类的价值共识，在思考如何汇聚价值共识上出思路、探路径，而不是把不同的价值理念统统拒之门外，人为自我筑墙，打造孤芳自赏的封闭式理论研究空间。

其次，讲策略。在复杂的国际政治斗

争面前，一味地、不分场合地强调“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马克思主义基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背景，往往会被误解为中国对外开展意识形态外交的战略工具，不利于在资本主义占据主导地位的世界体系中扩大“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国际认同度。这意味着既要重视研究“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站稳自己的立场，坚守自己的底线，又要避免时时处处凸显意识形态色彩，做到既“心中有数”，即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渊源，又“内外有别”，在话语表达和国际传播时注意淡化意识形态色彩，用国外受众更容易理解和接受的国际化理论话语、表达方式和思维习惯，更加有智慧、有策略地倡导和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既讲好“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中国故事，也要重视讲好“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世界故事。

再次，谋共存。“全人类共同价值”与西方“普世价值”有着本质的区别，这是毋庸置疑的。理性探寻不同价值体系在一定时间内共存的空间，做强做大自己的话语体系，更好地展现基于马克思主义视域的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理论价值和独特优势，是值得深入探讨的命题。

“全人类共同价值”话语的困境与纾解表明，新型话语体系的建构是可以通过研究视阈的转化加以实现的。视阈转换不仅可以拓展研究的空间和思路，而且可以开启全新的话语表达形式，展现出全新的理论意蕴，有助于建构起更具解释力和影响力的话语体系。在视阈转化中推动建构新型话语体系，可以视作研究和阐释党的创新理论的一种可行思路。沿着这一思路不断推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建设，将有力促进既入脑入心、又能作为国家和学术发展指南的话语体系的建设，推动构建具有中国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让新时代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更加充分地展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不断提升话语体系的涵盖力、解释力和说服力，使其在更广阔的空间、更深的层次上展现理论的时代价值。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研究”(22&ZD010)阶段性成果。]

## 中国传播学如何跨越新的“十字路口”

冯建华，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副研究员

进入数字传播时代，无论是理论范畴还是实践基础，中国传播学都面临着体系化的更新和优化。在百余年传播学历史中，关于学科危机的反思和讨论一直未曾中断，其中影响最为深广的是传播学先驱施拉姆（Wilbur Schramm）1959年提出的“十字路口”隐喻：传播学成为“一个伟大的十字路口，许多人经过但少有人停留”。<sup>①</sup>

与施拉姆当年所言的“十字路口”隐喻相比，传播学如今走到了一个新的更大的“十字路口”。数字媒介使用俨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传播学科走向“主流化”遂成不争事实。数字革命打破了传统学科界限，问题域的开放带来了学科集群新一轮分化与重组。沿袭西方体制化的学科细分模式，日益跟不上当今时代的学术发展趋势。不同以往的是，“媒介”和“传播”作为核心变量，不断深度卷入现实生活，成为诸多学科交汇的问题域。在此背景下，外学科学者进入传播学领域，可能再也不是穿梭于“十字路口”的“过客”，而是驻足深耕的“开辟者”乃至“竞争者”。例如，对于数字传播和算法伦理的研究，对于数字时代“信息”“数据”和“媒介”的研究，已不能说是传播学研究的固有领地，更不能说是其优势领域。在未来的学科交叉融合发展大潮中，中国传播学要成功跨过新的“十字路口”，形成自主知识体系，关键在于根植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沃土，不断凝练学科特色和优势，与时俱进提升理论学术原创力。

在学科渊源上，传播学主要脱胎于社会学。在西方舶来的中国社会科学门类中，社会学是“最早提出本土化的主张并卓有成效的学科”。<sup>②</sup>与之相比，传播学同样是本土化意识较为强烈的学科，并对本土化论题展开过持续讨论和实践探索。学科本土化的症结，关键在于如何解决知识创新力不足的问题。<sup>③</sup>虽然两个学科本土化的前提、境况和效果有所不同，但其所指向的核心问题和目标是相同的，就

是解决理论或知识创新力不足的短板，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鉴于此，从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实践经验中，可以给中国传播学科创新发展提供一定启示或动力。



### 聚焦“元问题”是构建学科体系之关键

构建中国传播学学科体系，首先必须回到问题的原点，即传播学研究的“元问题”是什么？“元问题”是促动学科发展的根源性问题，在某种意义上也可说是夯实学科根基的关键性问题。在“元问题”上不清晰或失去学术竞争力，学科体系构建就会失去核心支撑力，学科发展亦会逐步丧失原动力。中国社会学本土化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传统，就是持续深入聚焦学科之“原初问题”（即本文所谓“元问题”）。“任何一个学科如若不探本求源，坚持追溯自身的原初问题，而只是一味地嫁接、移植和复制别人的成品，就不会获得自身的自主意识，就没有能力发现自己的问题。”<sup>④</sup>

问题是时代的强音。一个学科关注什么“元问题”，需要基于总体性眼光和学术发展趋势，去回应和解决时代进程中的根本性问题。从中国社会学本土化历程来看，自20世纪70年代末恢复重建以来，不管

① Wilbur Schramm, “Comments on ‘The State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vol. 23, no. 1, 1959, p. 8.

②④ 应星、吴飞、赵晓力、沈原：《重新认识中国社会的思想传统》，《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4期。

③ 王宁：《社会学本土化议题：争辩、症结与出路》，《社会学研究》2017年第5期。



社会环境和理论研究如何变化，其始终将基本问题铺展在中国现代性的问题构架中，铺展在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铺展在中国社会制度和人心秩序的正当性位移中去思考，以此确立了中国社会学的“元问题”，即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社会变迁和转型。正如有学者所言，如果没有中国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那么社会学这门学科既没有产生的可能，也没有存在下去的必要。<sup>①</sup>这是社会学能够植入中国基因，进而快速成长为主流学科的重要原因。

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元问题”，同样需要从“中国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去探寻和确立。在观念层面上，关于传播学“元问题”虽已形成一定共识，但在具体研究中尚未呈现出清晰化的脉络主线。有学者提出，中国新闻传播学的知识扩张主要源于“知识生产的自循环和内生性繁殖”，即“知识生长是外力驱动型，甚至可以说是强迫型的，诸多知识生产不是内生性、本源性的”。<sup>②</sup>“元问题”应具有两个重要维度，一个是“真问题”，一个是“大问题”。中国传播研究领域出现“跑马圈地”的现象，从根本上说是由于“元问题”失焦而带来的“知识生产的自循环和内生性繁殖”。构建当代中国传播学的学科体系，关键在于找准具有内聚力和支撑力的“元问题”。换言之，如果没有贯通学科发展的“元问题”，学科体系的构建就可能失去根基，甚至可能呈现“四分五裂”之态。

鉴于此，关于新闻传播学“元问题”的探讨，近年来成为学界的重要关切。学者主要是从传播和媒介之变的视角，从人与社会和世界的联结关系中，重新思考和定位新闻传播学的“元问题”。将视野移至学科之外，俞吾金教授关于哲学“元问题”的思考，或许能给传播学带来更多启发。在其看来，哲学的活力和魅力正是体

现在不断地思索哲学的“元问题”过程中。人和周围世界的关系首先是意义关系，人的全部求知热情（包括哲学上的探索）都是在这种意义关系的地平线上展开的。只有先行地领悟哲学与人的生存活动之间的意义关系，才能准确地解答“什么是哲学”这一问题。因而，从生存哲学来看，哲学的“元问题”就是“为什么人们需要哲学”。<sup>③</sup>传播学面对的最重要的时代变局，无疑是数字媒介兴起带来的颠覆性传播变革。这种媒介迭代变革引发的不仅仅是信息生产和传播方式的巨变，更重要的是对于社会交往模式、社会关系结构和人类文明形态的重塑。这种时代变革以数字媒介为核心变量，推动着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世界关系的再造，日益关乎“人的生存活动”及其意义。如何理解和把握两者之间的关系，从而让数字传播为“人的生存活动”创造更好的环境和条件，实可视为传播学的“元问题”，其内含的答案即能解释“为什么人们需要传播学”。

从另一个层面来看，数字技术不断打破传统学科壁垒，并以问题为导向重塑新的学科边界。如上所述，很多问题，如数字媒介、元宇宙、算法、互联网治理等，实已成为诸多学科共同关注的领域。如何从中确立传播学的“元问题”，不仅关乎学科自主性问题，甚而关系学科“合法性”问题。近年来，围绕数字媒介这个核心变量，中国传播学界关于媒介、媒介性和媒介观的讨论，不断转向本体论层面。只有紧紧抓住这些关键变量展开深入研究，才可能在“元问题”视域中不断发掘中国传播学研究的真问题和大问题。反之，失去了对“元问题”的聚焦式深耕，中国传播学的学科根基则难以变得坚实，更遑论形成具有鲜明时代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 强化实证研究是构建学术体系之基础

传播学以实践性为底色，实证研究是其基本的学科传统。学科传统是学科属性之标识，在很大程度上塑造着学科的精神气质。然而，受多重因素影响，这种实证研究的学科传统并没有被很好地承继和发扬，在某种层面上甚至呈现逐渐弱化乃至被边缘化的趋

① 应星、吴飞、赵晓力、沈原：《重新认识中国社会的思想传统》，《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4期。

② 张涛甫：《立足中国现场 回应时代之问——兼论中国新闻传播学的主体性问题》，《新闻记者》2022年第5期。

③ 俞吾金：《再谈哲学的元问题》，《学术月刊》1995年第10期。

势。从专业学术期刊发表情况来看，科学规范的实证研究成果并不多见，能有独到发现或者能够推动理论创新的则更少。

构建当代中国传播学学术体系，离不开实证研究传统的强大支撑。进入数字时代，传播的现代化成为国家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传播效能与国家治理水平日益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没有传播的现代化，就难以真正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而要实现传播的现代化，首要前提就是必须借助科学规范的实证研究方法，探析和掌握数字传播的原理与规律。当下的中国传播研究，总体表现出理论创新乏力，甚至不时呈现理论与实践“两张皮”现象，从根源上来看与实证研究不到位或不够扎实有较大关系。

强化传播学实证研究传统，首先需要打破对于实证研究的思维定式与认知偏见。很多人在潜意识中认为实证研究属于应用型研究，学术价值不高，对于促进理论创新和学科发展难有实质性助益。从现实情况来看，受学术环境和科研考评体制影响，科学扎实的实证研究通常需要费时耗力，不易快速出成果，这可能会使研究者陷入科研考核的被动境地，故只好望而却步，舍“远”求“近”。

传播实证研究的弱化，与研究对象属性发生变化亦有一定关系。数字传播已超越传播效果的实用功能层面，对人的主体性、社会结构关系和人类文明形态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故而需要回归人文学科传统，更多运用反思和批判的研究方法，如此才能更加深层次把握和理解数字时代的人类社会传播活动，也才能更加自主性地借鉴和发展经典传播学理论。在此多重复杂背景下，中国传播学研究总体呈现出人文化和思辨化的色彩。这并不是说人文主义的研究方法不重要，而是旨在表明这类质性研究若能建立在强大实证研究基础上（不然难以切近问题实质而成为空泛之论），则可能取得更大的理论创新突破，从而更好地回应和解决时代进程中的重大问题。

实证研究不仅可用于检验理论，而且是推动理论学术发展的重要力量。从学科属性来看，传播学理论创新的动力源泉，主要是来自或依托于扎根实践的实证研究。这是传播学学术体系能够体现中国特色、中

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必经之途。反言之，如果失去充盈而必要的实证研究支撑，中国传播学则可能像“断了线的风筝”，逐渐脱离其学科传统，失去根系滋养，构建的学术体系自然亦犹如空中楼阁，失去与现实相呼应的自治性和解释力。

反观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其之所以能够取得比较理想的效果，就是坚守“面向实践用力的学术传统”，“社会调查是其最坚定的信仰”。<sup>①</sup>在中国社会学界，长期盛行一种观念，即“无计量，不学术”。其虽有些“偏执”，但足见社会学对于实证研究传统之看重。在社会学本土化论争中，关于议题、应用、范式的讨论均来自社会学的本土调查与探索发现，有强烈的问题导向和实践指向。<sup>②</sup>正是坚守面向实践的实证研究传统，中国社会学才能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如关于农民工、“城中村”、留守儿童等问题的研究。

与此同理，中国传播学要成功跨越“十字路口”，构建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学术体系，在很多重要和基本问题上不但不能丢弃实证研究，反而需要更加强化实证研究的传统和方法。如上所述，关于数字传播和智能媒体的研究，如果缺乏扎实有力的实证研究，则根本难以掌握新技术衍生的传播机理，不然其研究就犹如“盲人摸象”，更遑论理论创新突破。再如，很多孕育于大众媒体时代的传播学经典理论，如议程设置理论、使用与满足理论、意见领袖与二级传播理论等，其是否继续适用于数字传播时代，特别是其能否有效解释当今中国独特的数字传播现象及实践，都有赖于科学扎实的实证研究予以验证或修正。

从另一个层面来看，失去实证研究的有力支撑，中国传播学研究就可能落入用西方理论强制阐释中国传播实践，或者用中国经验“佐证”西方传播理论的窠臼。如今不少

① 应星、吴飞、赵晓力、沈原：《重新认识中国社会学的思想传统》，《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4期。

② 周彤、张大伟：《社会学本土化论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建设的启示》，《编辑之友》2023年第2期。



传播研究止步于对西方理论的诠释或经验论证,从根本上来说正是由于缺乏扎根本土实践的实证研究,对西方理论“进得去,出不来”,只能停留于概念或知识的演绎,其带来的可能结果就是长期徘徊或游离于“十字路口”,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术体系更无从谈起。

蕴含的、为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具有类型普遍性意义的理论流派,就越能弥补世界社会学界在这种类型普遍性理论上的欠缺,因而越能引起世界社会学界的注意和承认。”<sup>②</sup>

由于学科历史及属性的差异,中国传播学发展不可能复制或简单模仿中国社会学,但在理论与话语创新的动力和方向上,后者当可为中国传播学提供方法论上的启示。前文已述,正是聚焦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社会变迁和转型,这个“其他国家所不具备”但又“具有类型普遍性意义”的原初问题,中国社会学才能集中学术研究合力,在事关学科发展根基的“元问题”领域不断取得理论创新突破,建立起中国社会学的话语体系。与此对照,中国传播学要成功跨过“十字路口”,努力实现“中国化 1.0 版”,一个重要路径就是嵌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依靠大量科学、扎实、有效的实证研究,推进理论和话语体系的创新,方有可能实现“版本”优化和升级,以至于进阶为“具有类型普遍性意义”的“中国化 2.0 版”。

从实际情况来看,中国传播学完全具备这样的现实条件。无论从媒介体制还是社会环境来看,中国的传播实践完全不同于西方社会。特别是伴随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深入推进,由技术和社会交互变革推动的数字中国建设,必将衍生出丰富的数字传播实践。这无疑是“其他国家所不具备”但又“具有类型普遍性意义”的问题域,为推进理论创新和构建当代中国传播学话语体系提供了丰厚沃土。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大潮中,传播结构和媒介生态也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巨变。新技术革命打破了学科分界,传播学走到了一个新的更大的“十字路口”。如何跨越这个“十字路口”,在学科交叉融合中重塑自主知识体系,是构建当代中国传播学“三大体系”的根基工程。本文仅是从宏观层面提出三个路向选择。概而言之,聚焦“元问题”是构建学科体系的关键前提,强化实证研究是构建学术体系的基础动力,面向中国式现代化是构建话语体系的重要路标。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全媒体时代公共传播治理的理论创新研究”(20BXW039)阶段性成果。]

### 面向中国式现代化是构建 话语体系之路标

美国社会学家乔纳森·H.特纳认为,理论是一个提出观念的过程,这些观念使得我们能够解释事件如何以及为什么发生。在其看来,理论包含四个基本要素:概念、变量、陈述与格式。概念孕育于特定的经验过程,能够呼应或解释特定时空下的特定现象。<sup>①</sup>由此而言,理论创新的基础在于提出具有特定解释力的概念,其关键在于能否抓住“变量”特征,从而“能够解释事件如何以及为什么发生”。当今中国传播学的理论和话语创新,即应从传播和媒介的“变量”切入,解释作为“重要事件”的中国式现代化“如何以及为什么发生”,进而思考和探索如何以传播的现代化推进国家的现代化。这是中国传播学不可回避的时代之问,也是构建当代中国传播学话语体系的路标。

构建当代中国传播学话语体系,可从社会学本土化得到启示或“旁证”。社会学学者王宁认为,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提出,标志着“社会学中国化 1.0 版”基本完成,但也应看到,“中国社会学学者的研究成果基本上还停留在国内学术圈的学者相互承认的范围内”。目前,中国社会学正在朝着“2.0 版”努力,以使得“中国社会学研究成果进入国际社会学界的主流话语体系”。“中国社会学越是揭示了本土社会所

① 乔纳森·H.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吴曲辉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6—10页。

② 王宁:《迈向社会学中国化 2.0 版:挑战与路径》,《社会》2022年第6期。